



看待外储下降 不必草木皆兵

本报记者 王俊岭

针对“外储逼近3万亿美元关口”的担忧，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外储下降既有应对美元升值、合理引导人民币汇率预期等市场因素，也有中国经济双向开放程度加深、企业及居民用汇需求增大等经济基本面原因，因此属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没必要草木皆兵。

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二是外汇储备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三是由于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计量货币，其它各种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可能导致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四是外汇储备在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资金运用记账时，会从外汇储备规模内调整至规模外，反之亦然。

国泰君安的一份报告指出，2016年12月外储变动基本符合市场预期，降幅也较上月收窄了279.76亿美元。同时据测算，由于2016年12月欧元、英镑、日元对美元分别贬值1.2%、1.9%和3.5%，仅这些波动就造成了100多亿美元的外储损失。如剔除这种估值效应，2016年12月我国外储降幅已明显缩小。

“从全年的情况看，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外储规模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估值方面，非美元对美元总体贬值和资产价格变化也对外储规模造成影响。总体而言，2016年的全年降幅比上年同期少降了1928.12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焕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看待外储储备需要结合外储购买力、本币国际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综合判断，没有必要对实际意义并不大的“整数关口”过度敏感甚至草木皆兵。“比如，虽然外储有所下降，但更要看到其中的美元出现明显升值，综合而言中国外储的购买力未必减少

太多。”张焕波说。

正常用汇保障充足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人士表示，市场应该更关注外储储备能否持续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能否抵御外部风险冲击，而非一个具体点位。目前来看，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储储备是充裕的，处于合理稳定区间。

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看来，首先，外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元走强，而非资本外流；其次，中国外债去杠杆进程已基本结束，不会出现企业大量购汇还外债的情况；最后，目前中国外储规模接近全球的30%，足以应对市场流动性需求和抵御外来风险。

“从整体形势来看，中国贸易顺差维持在经济总量的3%左右有望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双向开放的格局也较为明显，外资来华与中企‘走出去’规模总体均衡，因此当前我们外储的体量和新增量将足以满足企业和居民的正常用汇需求。”张焕波分析。

除了贸易顺差，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也有望增加外储。德意志银行的调研显示，如果中国债券被纳入全球债券指数，未来5年内会有7000亿美元至8000亿美元的新增外资流入中国债市。而这，亦

将进一步支撑人民币汇率。

稳健政策精心护航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与金融监管的不断完善也将有助于外储储备更好地服务民众。

在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框架和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内容被明确写进了2017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中。专家指出，这些表述背后是十分明显的“稳健”政策取向，这些都有利于稳定并用好全国的外储储备资源。

“一方面，官方外储储备规模虽然有所下降，却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转化成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和居民的外汇资产，这些转变显然有助于发挥外储储备服务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功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其实也已经发展到了不需要特别依赖外储的阶段，如今人民币在海外支付、结算、储备等场合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多。”张焕波说。

此外，中国进一步扩大吸引外资的政策也将客观上推高外储储备。商务部人士表示，今后将通过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相关政策法规，大幅度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



武汉加强智慧城市建设

1月7日，一名武汉市民在武汉关轮渡码头通过扫码支付乘坐轮渡。

根据近日在2016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峰会上发布的“互联网+指数”，武汉在“互联网+政务”排名中排行第一、“互联网+便民服务”排名第四。依托移动支付技术，武汉市民在缴纳水电燃气费、看病挂号、衣食住行等方面正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熊 琦摄（新华社发）

居民生活服务业“五年规划”发布 营业收入已超过5万亿元

本报北京电（记者邱海峰）5日，商务部发布《居民生活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0年，初步形成优质安全、便利实惠、城乡协调、绿色环保的城乡居民生活服务体系，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大众化、多元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这也是我国首部居民生活服务业“五年规划”。

据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负责人介绍，所谓居民生活服务业，主要包括餐饮、住宿、家政、洗染、沐浴、美容美发、家电维修、人像摄影等行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行业，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据测算，中国居民生活服务业营业收入已超过5万亿元。从整体上看，中国居民生活消费快速增长，服务供给日益丰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但同时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质量不高、负担过重等问题。为有效解决居民生活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面落实相关规划纲要，商务部制订了这一《规划》。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服务需求为出发点，《规划》重点围绕提高供给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环境、规范供给秩序等方面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80余家跨境零售企业入驻上海 数量仅次于伦敦和迪拜

据新华社上海1月8日电（记者吴宇）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球340家跨境零售企业中，已有180余家入驻上海，数量仅次于伦敦和迪拜列全球城市第三。上海已成为全球商业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目前，上海大街小巷星罗棋布的各类超市和连锁零售商店已接近7200家，全市2400万常住人口，平均近3400人就有一家，零售连锁业态发育程度全国领先。上海还拥有15个市级商业中心、30多个地区级商业中心以及67个特色商业街区，全市标准化菜市场达960多个，社区微菜场超过1000家。

在全球跨境零售企业争相入驻的背后，是上海持续增长的庞大的消费市场。数据显示，上海商业的开放魅力不仅辐射全国，对国际商旅游客的吸引力也在攀升，并有效引导部分境外消费回流。上海正在超越香港、新加坡等老牌“购物天堂”，成为受人瞩目的新的“国际消费城市”。

中国创新产品 亮相拉斯维加斯

1月6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者在一家中国企业的展位上观看一个接受语音指令进行各种舞蹈动作的机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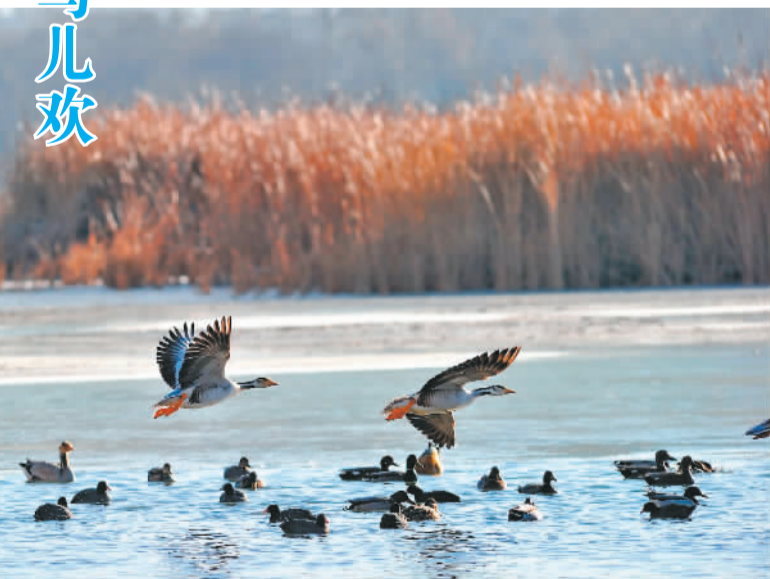
此次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充满了中国元素，3800多家参展商中，超过1/3来自中国。一批颇具竞争力的中国创新产品在展会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入冬以来，位于拉萨城边的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候鸟增多，斑头雁、赤麻鸭、野鸭等数十种候鸟在这里过冬。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3600多米，被誉为“拉萨之肺”。图为拉鲁湿地上的水鸟。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旅行新势力计划”助力自媒体发展

本报北京电（记者聂传清）由新浪旅游、优酷旅游联合主办的“享耀全世界·旅行新势力盛典”1月6日在北京举行。作为国内两大旅游自媒体内容生产和消费平台，双方发布“旅行新势力计划”，将投入数亿元，为旅游内容生产者尤其是旅游视频创作者赋能，提供从内容生产到变现的全程支持，共同推动旅游视频内容制造和传播升级。

“旅行新势力计划”主要是从三个层面助力旅游自媒体成长：第一是个人品牌成长的扶持，对于有视频创作能力的旅游自媒体，微博和优酷将定向推送给旅游兴趣人群，

帮助其快速积累粉丝和知名度；第二是流量和曝光的扶持，双方将在各自平台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全方位增加原创内容的曝光量，与此同时，实现优酷视频在微信信息流当中的卡片展示，提供更佳阅读体验；第三是差旅成本的支持，双方提供机票、酒店等差旅支持，分担旅游自媒体拍摄成本。“旅行新势力计划”还将引入内容联动电商的变现机制。

双方的联手将加速优质旅游视频内容的产出和传播，在丰富旅游内容传播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促进整个旅游生态的良性循环，推动旅游视频社交新时代的来临。

中国企业税费到底高在哪里

本报记者 李 婕

近日，关于中国企业成本和税费负担的大讨论引起关注。一时间，“死亡税率”、“高税负逼走制造业”、“税高费更甚”等观点喷涌而出。事实究竟怎样？企业负担如何减轻？在开年首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态：“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专家表示，破解制造业税费成本高难题，需要“认真真减税，实实在在降费”。

板子不能全打“税”

来自财政部的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3%降为25%，如果进行国际比较，这一税率属于中等水平。中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17%，在世界上160多个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间水平。这两大税种，约占我国税收收入60%，是最重要的两个税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指出，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

对于业内出现的“死亡税率”说法，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政认为，税率高低是相对的。如果漏损率低，并与公共服务相匹配、与国家发

展阶段相匹配，即便税率也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漏损率高，并与公共服务不匹配，即便是税率低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单纯从税率高低无法判断企业的负担。

负担顽疾在于“费”

导致企业税负压力大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土地等一系列审批成本，是一大块。多位专家对企业税费成本调研的结果，与李克强总理的结论不谋而合。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上市公司年报或企业自行披露的费用来看，中国的各类‘费’非常多，且不透明。这既包括明面上的费，也包括各类寻租和灰色成本。‘费’没有法律来规定，其中不规范的地方就更多。”他认为，而且由于费的征收具有相对随意性，这就为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预期带来不确定性，让投资环境中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不利于新投资的进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认为，这些非税的负担不仅是指为获得资源、土地和融资而支付的实际价格，也包括了政府向企业收取的名目繁多的附加费。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代价去获得土地和融资等，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久而久之，这些都可能动摇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优势。

破题要内外兼“治”

对于税收，财政部回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放水养鱼’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收制度，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财政部回应称，对于缴费多的问题，财政部还将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1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在本届政府已取消230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再取消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备案核准、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53项许可，取消与法律资格认定、铁路运输基础设施生产服务企业审批等有关的20项中介服务事项。

李政认为，认认真真减税，实实在在降费，才能够切实为企业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环境，才能有效应对人力成本上升的必然趋势，降低我国制造业企业总成本。

“税费改革一定要进行。但是从企业的自身反应来看，这个过程相对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应该主动出击，有所作为。对于制造业来说，重点还是树立品牌，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提高自己的制造水平和回报率。”周清杰说。

